



都市快报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

快报周末 B 版

DUSHIKUAIBAO

第 436 号
国内统一刊号 CN33-0099
2000 年 3 月 19 日 / 星期日

热点阅读

“我发现了一个纪录片的天才！”



丽玲与《我们的留学生活》

一个天生丽质的杭州女孩，十一年前从北京飞到东京，学着日语，做着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的梦。后来，她用四年的时间把这个梦变成了现实，并让许多中国人看到了这个梦……她就是近日浙江有线娱乐台刚刚播放完的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的策划、导演、制片人张丽玲。最新出版的《追梦女人》为我们打开了她和这部感天动地的纪录片的世界……

——编者

1996年3月13日，一个由中国人和日本人组成的摄影组组成了，中国人有张丽玲、张焕琦、张丽烨，还有一些不固定的成员，日本人有导演池田和几个年轻的实习生。这是张丽玲等待了许久的日子，也是张丽玲的梦想开始变成现实的日子。磁带放进了摄像机里，焦距调准了，摄像机转动了，张丽玲的梦想在镜头下延伸开来，无数在日本的中国人挤进了镜头里，张丽玲把活生生的现实搬进了另一个形象世界里，等待国内的中国同胞欣赏，等待全世界的人观看。

从此以后近九个月的时间，横山隆晴再没出现。他本人一年有近300部片子挂名，他分身乏术，张丽玲这边就全交给了那个叫池田的导演。

摄像机终于有了，摄制组终于有了，剩下的就是去拍摄了。张丽玲恨不能每天工作24小时，可是她是大仓的员工，每周七天的时间有五天属于大仓，只有两天属于摄制组，没有时间保证，拍摄的进度就快不起来，即使把那五个黑夜全部用上，也拍不完那些在为生活和命运抗争的中国留学生。张丽玲只能缩短她的休息时间，能够利用起来的每一分一秒都用在拍摄上。

日本的摄制组是按工作日来计算时间的，不管一天干多少活，只要出勤，就算一个工作日。张丽玲知道一个工作日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一边自己没命地干，同时也要求摄制组把时间利用到最大限度，有时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

有一次他们去东京的一个海鲜集散市场——筑地拍摄，张丽玲让日本人见识了什么叫拿生命作赌注。在日本的电视界凡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只要是夏天去拍筑地，那就是一天只能在这里干活，而不能再到处去，因为筑地的环境非常差，味道难闻，垃圾遍地，再加上天气奇热无比，一走进来就会让人恶心，别说再扛着几十斤重的摄像器材了。他们凌晨4时就来到筑地，摆开摄像机就拍。正值夏天最热的那一段时间，市场里的温度很快上来了，张丽玲与拍摄人员的

衣服不一会儿工夫全部被汗水湿透，需要不断地喝水以补充体内的水分。那天张丽烨也一同来了，她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去给摄制组买水。张丽玲与所有的女孩子一样非常爱干净，可是她竟能与男人一样经受得住臭鱼烂虾的味道，连摄制组的人都感到惊讶，表面上看起来如同一朵荷花一样一尘不染的女子来干这种活，真不知她图个什么。

一连拍了近八个小时，终于拍完了，那几个年轻的日本人脱下衣服，拧着汗水往下滴，嘴里说着：“总算拍完了，简直快要脱水了，赶紧回家洗个澡，把身上的臭味洗掉。”

张丽玲却说：“对不起，现在咱们还不能回家，我已经联系好了另外两个人，需要现在马上去拍摄。”

摄像师顿时火了，眼睛瞪得鸡蛋一样大，叫道：“你有没有一点常识，谁敢拍完了筑地还去拍别的？你是不是疯了？”

其实张丽玲心里也非常愧疚，实在不忍心提出再去别处拍摄，可是她也不知道拍筑地会那么累，事先联系好的拍摄也不能不去。她只好要求摄制组配合：“我知道你们累，你们热，我也与你们一样，但已经联系好了不能失信，你们只好辛苦一点，拜托了！”

“我们不干，要去你去。”

“好，那你们把摄像机给我，我去了！”

张丽玲的态度非常坚决，日本人无话以对，他们决没想到一个小女子态度会这么坚决，让人无法拒绝，而她本人的作风又让人觉得如果不做简直就是懦夫。更何况摄影师是不敢把摄像机让给别人，他们只好跟着张丽玲走。

姐妹俩就这样惭愧又无奈地说服那几个日本人，下午拍完，又拍了一个晚上，直到把接下来的两个人物拍完时，已是凌晨两点。现在播出的十集片子里，只用了那天拍摄的两个镜头。

那天的平均温度是41摄氏度，他们共喝了68瓶矿泉水。张丽玲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日本导演池田对拍摄的事情不是很上心，却一直在打听张丽玲经济的问题，经常在拍片间隙抓住张丽玲，问道：“你到底有多少钱？”

说老实话，经费一直是困扰张丽玲和整个摄制组的问题，虽然横山隆晴慷慨地提供了摄像机、技术人员，但张丽玲总要承担其他一些基本的费用，车辆、吃饭、磁带等等，都是要花钱的。张焕琦曾经回国找钱，可是没有找到。张丽玲就决定自己筹集。张焕琦说这样风险太大，不但要冒失业的危险，还要把自己的积蓄都搭进去，而片子能不能播出都还是未知数，下这样大的赌注，搞不好会耗进去后半生所有的财富。张丽玲说那就耗进去。能下这样大的决心，的确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张丽玲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又在亲朋好友中借了一些，先凑了约有一千万日元，先让机器转起来，然后打算一边拍一边找钱。

当时张丽玲的姐姐和姐夫还在日本，拍完以后，他们要回国，张丽玲就说：“那正好，你们走吧，把存折留下。”张丽玲的姐姐和姐夫只好乖乖地把存折留下了。

张丽玲的钱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凑起来的。机器一转动，钱就如水一样地花掉，很快，一千万日元就光了。

等摄制组实在没钱的时候，张丽玲回过一次国，找到在国内做了老

板的好朋友，向他诉说拍片情况，并说：“我肯定会还你，但你要做好我还不起的准备，在我还起你你还要借我的前提下，你才能借我，但我这辈子会尽我的最大努力去还你。”

朋友马上拍给张丽玲十万美元，对张丽玲说：“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我借给你钱虽然是看你的情况，但更重要的是凭我作为一个商人的直觉判断，我觉得你所做的事情很有希望，才会把钱借你的。我知道你的性格，过去你是从来不肯借的，现在你借，说明你对未来抱有信心。你尽管用，不要内疚，只要把片子拍好，什么都会有的，钱更不用愁。”

张丽玲回到日本，日方摄制组的人总是追问她向谁借的钱，要去采访人家，要去感谢人家。张丽玲劝阻，因为朋友有言在先，他不要任何名誉上的回报。

拍摄在继续，张丽玲与张焕琦的担心也与日俱增，因为他们越来越发现池田率领下的摄制组不能达到他们的拍摄要求，张丽玲多次找横山隆晴，想把情况如实地反映给他，可是到哪里去找他的踪影呢？一年要负责300部片子的拍摄，他怎么可能有时间再来过问一个与他本职关系不大的片子呢？张丽玲忧心如焚，却不知道怎么办。

有时摄像师人手不够，张焕琦就充当摄像师，《家在我心中》里丁尚彪与女儿地铁中分手的一节就是张焕琦拍摄的。很久以后张焕琦还忘了他当时拍摄的情景：“丁尚彪和女儿在东京地铁分手的时候，我比老丁还紧张。我一直在琢磨，分手时会发生什么事。我想必须保证全景。我带着耳机，别人提醒我：‘你哭了’，我尽力保持冷静。老丁毕竟曾经当过工厂的领班，起初克制住了眼泪，老丁下车了，再也克制不住如注的泪水，我将镜头徐徐地从他女儿的泪脸转移到了站台上的老丁，车内安静极了，一直到成田机场，没有一个人说话。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摘下眼镜使劲地擦了又戴上。”

九个月过去了，张丽玲、张焕琦、张丽烨以及每一个被拍摄过的中国留学生都付出了许多心血和热情，当然池田领导下的摄制组也付出了心血和热情，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些心血和热情能换来什么。

1996年似乎倏忽之间就要过去了，又是年底了，横山隆晴终于从诸多事务中分身出来，来看一看张丽玲的拍摄情况。他得知张丽玲要带领摄制组到东京郊外的高尾山进行现场拍摄，就跟着一起来了。

11月16日，张丽玲在高尾山拍摄的是一个在日本生活多年的“黑人”小陈，他在日本没日没夜地打工，连一天也没有休息过。决定回国了，他听朋友说过，东京郊外的高尾山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地方，从那儿可以看到东京的全景，他想在回国的前一天，最后看一眼他生活了多年的东京的全貌。

池田等一拨人跟着张丽玲、张焕琦按照原来的方式拍，他们用固定三角架，拍摄纪录片中的人物，有时因为一个画面没有拍好，甚至让被拍摄者重新走场。张丽玲偶尔问小陈几句话，与小陈进行简单的情感交流。

拍到晚上，该收工了，横山隆晴还是没说一句话。回到东京，横山让张丽玲和张焕琦到富士电视台的地下食堂，这时已近夜间12点，横山隆晴突然来到张丽玲面前，对张丽玲鞠了一躬，悔恨而又严肃地说道：“对

不起，张丽玲，我非常失职，我想我一直都在给你帮倒忙，耽搁了你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向你道歉。”

接着横山隆晴对拍摄中许多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他说：“你们简直不是在拍纪录片！”

从此，一切开始了180度的转变，横山隆晴把池田的人全部换掉，换上一流的可以配得上拍这部片子的人，包括一个叫做远藤一弘的摄像师、后来的剪辑师和另外一些技术人员。

对于那天在高尾山的拍摄，横山隆晴后来有过一段详细的心灵剖白：“我决定跟随他们去，从早上到晚上，我一句话没说，我心里想，这样的拍摄砸锅了。这些人根本没有明白纪录片是怎么回事。作为有经验的导演，我感到恼怒。也感到悔恨不已。我后悔竟然借口自己工作忙，耽误了接近一年的时间。我默默地看着他们拍，一句话也没说。直到太阳落山，我们收拾家当往回走的时候，我说能不能请摄制组到富士电视台食堂吃顿饭。在食堂，我抑制了一天的怒气爆发了。这简直不是可饶恕的罪过。我说，你们的设想的确是了不起的，我怎么能够一次也没有到现场去！我谴责自己，派出第一流摄影师远藤参加拍摄。当然我征求了远藤的意见，远藤是在和他们接触了以后，自己决定作为自愿者，不拿薪金加盟。”

张焕琦后来说：“到了红叶的日子，我们要拍‘黑户’，横山也一块去了。我们拍到很晚。横山请我们一起去富士电视台吃饭。横山问我们拍摄感觉怎么样，我们说我们就这么工作。横山却发火了，说道：‘你们的拍摄方法太奇怪，让人再走一遍，这是违反纪录片规则的。’其实我和张丽玲对这种做法也感到怀疑，但是我们是受援助的人，不敢说。横山决定把班子全部换掉，换上正式拍纪录片的远藤。这次交锋使我们明确了许多，最重要的是对于纪录片的创作态度，纪录片强调对被拍摄者的尊重，不干涉他们生活。日本人认真地执行这一点。这次交锋持续到早晨，在争吵中的所有的问题都谈到了。我们找到了强烈的自信。那就是只要把全部心灵都拿出来的话，那至少是真诚的。这次争论使得拍摄走上了正轨，从这以后，我们的拍摄全部符合国际规则：对生活的自然运转保持默默的静观和跟蹤。”

但是那天横山隆晴也不是没收获，在他沉默、愤恨和自责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纪录片的天才。

数年以后，他这样对记者描述他的感觉：“……我看出了张丽玲是一个纪录片的天才。作为策划和导演，张丽玲用的是中文和被拍摄人小陈对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是，凭着多年拍摄和制作纪录片的经验，我发现张丽玲对纪录片的感觉特别到位，就在她和小陈接触的瞬间，她与被拍摄人的心灵的沟通细致而准确，与其他完全不同，几乎天衣无缝。我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对话，但在从山下往山上走的时候，小陈的那种无可奈何的神情，那种呼吸，被张丽玲恰如其分地捕捉到，小陈的心情，被张丽玲无一遗漏的摄入她指挥下的镜头。这是了不起的才能。我们平常看到的普通纪录片，通常要与被采访人建立情感沟通。而张丽玲第一次与被拍摄人见面就可以潜入被拍摄人的内心世界，与他进行内心的对话，张丽玲是一个心灵大师，是一个天才。我的确为之震惊。”

摘自《追梦女人——张丽玲与“我们的留学生活”》(标题为编者所加)光明日报出版社 定价：23.00元

新书过眼



《宝岛归清记》任敢民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定价：26.00元

该书的副标题为“清廷降伏台湾郑氏政权演义”，从公元1661年郑成功突袭台湾，赶走荷兰殖民者写起，到公元1683年清军水师登陆台湾岛，郑克爽投降止，全景式地再现了以郑经父子为首的台湾割据势力和以康熙为代表的中央政府之间和战的历程。在这22年中，双方战火连年不断，大小和谈不下十次。和谈的关键分歧是郑氏集团要求的“如朝鲜例”，与清朝“约为兄弟之国”；清王朝则主张郑氏集团可以在台湾有较大的自主权，保留军队，“世守台湾，受藩封”，但不能独立成国……正因为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宝》中描述的内容能给我们今人很多的启迪，这是该书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作者任敢民为浙江电台记者，有评论说“……抓到了一个绝好的题材，填补了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空白。”

《知识改变命运》刘县书 潘燕编写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定价：15.80元

这句话你肯定再熟悉不过了。中央台的公益广告中经常会有以“知识改变命运”为主题的广告，每次短短不过一分钟，但却让人感动不已。据说，这些广告是由李嘉诚先生创意，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共同投资，特邀顾长卫导演并拍摄的，希望广为传达一种重视知识、树立知识与个人及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观念，片子采用的是纪实手法，富有冲击力……曾经有过“这么好的片子为什么没有出VCD出售？”的念头，现在书出来了，而且还随书附赠VCD光盘一张，实在很值。

《我们应该崇拜谁》东毅 继军/编
群言出版社 定价：16.00元

这本书的封面上说：这是一本宣告偶像崇拜时代终结，体现民间思想者锐气的书。其实说得通俗一些，这是一本集结了近期媒体中精彩批评文章的书。编者在后记中说：这几年来，我们不断地发现有批评价值的文章见诸报刊，这在缺少批评空气，价值判断模糊的当下，已是久违了的景观。从内容来看，还算挺有“卖点”：如李敖的“没有窗，哪有窗外”(批琼瑶)、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赵少钦、王俊的“刘晓庆‘皇帝的新装’”、成志的“凭海临风——一本难得的‘注水书’”、晓林的“解说‘宋世雄’”等。

《徽州》王振忠 李玉祥著

三联书店出版社 定价：29.00元

这是三联书店“乡土中国”系列中的一本。去年10月出的《南溪江中游古村落》市场反应不错，这次则将镜头对准了徽州。“乡者，故乡也，土者，民间也”，数字化的今天，现代都市人们对历史遗留下的印痕已无可言说，老村、古镇、旧宅、败祠、发黄的族谱，或可引发人们对乡土中国的思索。与现在流行的老照片系列不同的是，它的图文随记形式做得非常精美，绝少沉腐与陈旧之气，打开书，就似打开了一片乡土气息的传统文化博物馆。

(以上图书杭州晓风书屋有售)

责任编辑 姜贤正 版式设计 张革